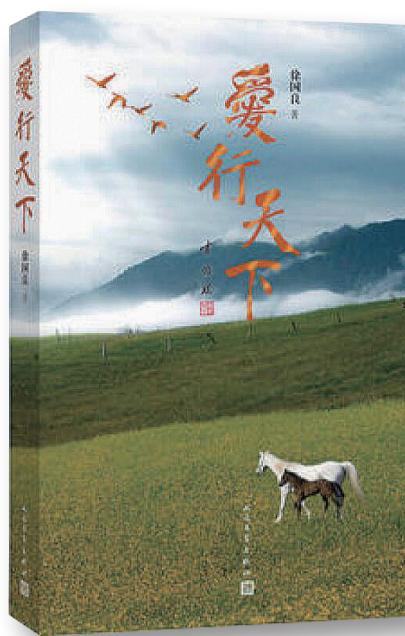


■第一阅读

爱的呼唤，爱的礼赞

□雷 达



徐国良的这本书,按散文、随笔、美文的种种标准来要求,可能更具边缘性文体的特点;它打破了某些常规,打通了某些界限,它质胜于文,注重于表达胜于文辞的修饰,但它所具备的充沛的内质,感人的力量,是许多过于雕琢的程式化的“美文”所无法达到的。所以,我首先要说的是,这是一本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现实的针对性,颇能触及时代敏感神经的作品;它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色,就是紧紧围绕当代人的道德伦理现状,注重生活性、日常性,甚至世俗性,有一种“入世”的积极品性,它的核心是干预人的灵魂。读下来会发现,这些文章,据事论理,针砭时弊,真诚朴实,妙语迭出,很能引发人们的思考。

比如《康复日记》,记述了一位丈夫,以惊人的毅力,挽回了几乎不可挽回的生命,并且使得车祸后已成植物人的妻子,最终站了起来。这位丈夫说,我护理代琼四年多,几多悲痛?几多苦累?几多艰辛?天不晓得,地不晓得,代琼也不全晓得,但我自己晓得。这是一个丈夫的职责。我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丈夫”这两个字。在康复代琼身体的同时,也康复了我对爱情的认识:只要有爱心、有恒心,什么人间奇迹都可能创造。这位丈夫还坦率地说,外国有个“情人节”,中国有那么多人跟着过“情人节”,为啥中国就不能有个“爱人节”呢?能有这个节来帮助人们纪念和留住那份纯真的爱情、那份美丽的想念多好!这使我想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爱情的意义就在于帮助对方提高,同时也提高自己。”

在作者笔下,爱不是空洞的,也不是盲目的,爱是具体的,是有特定时代内涵的,因而是广阔而丰富的。爱,始终伴随着人类,爱有自己伟大的传统,爱是人类最伟大的感情,对中国来说,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爱的基础。一个人对祖国,对家乡,对人民,对父母,对师长,对周围所有人的爱与尊重,比世间任何东西都更重要。例如,《舅父的品格》,就是一篇感人的作品。这里的爱,不仅仅出于血缘,骨肉之情,而是这位弥留之际的舅父,有许多超乎常人、令人尊敬的高尚品德。他做村官一辈子,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宁可自己倒霉,也不愿群众倒霉。有

的坐标建立在官衔权力、物质财富上,必然导致为了获取权力、金钱的角斗,不正当竞争必然引发道德的堕落。物质占有和感官享乐的指数越来越高,幸福的指数必然越来越低。

在今天,呼唤爱是多么迫切,多么重要!《爱行天下》的字里行间,蕴含着徐国良在人类道德文明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对我们民族道德文明建设的思考。当今社会的急速变化,万花筒般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梦想追求相互博弈又相互兼容。人类积聚了几千年的精神遗产:善良、仁爱,似乎成为当代人精神的稀有元素。正如霍尔巴赫所说:“在一个极度自私的社会里,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互为仇敌。每个成员都只为自己生活,很少顾及他人。每个人都只受自己欲望的支配,只考虑与社会利益背道而驰的个人利益,正是那个人对人是豺狼的时候,作为那个社会成员的人,有时比起生活在深山密林中的野人还要不幸。”书中不少文章涉及造假、欺骗者的卑劣嘴脸,如《铁戒指》中的老板和周围的说情人,可谓司空见惯。

写故乡的文章占了重要分量。作者说,乡愁是本永恒的书;乡愁是首无尽的歌;乡愁是我永远苦涩而甜蜜的记忆。我写下点滴滴,留在纸上,想让这些有文字的乡愁,供我年老体衰后时常反刍,想让子孙后代不把乡愁当作传说。作者抒写了强烈的怀乡之情。几千年的类社会一直存在着流动,当今社会的流动更为频繁和遥远。那些远离家乡漂泊异乡的人,必然怀念生养自己的故乡,必然怀念总角之交的老友,必然怀念故乡的生活。对故乡的怀念是家国情怀的召唤,是善良和挚爱的外现,可以演化为忧国忧民、称合国家创伤的诉求,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文学创作的重大母题之一,是种美好的善爱情感。应该说,这些篇章也是全书最动人的部分。

在《爱行天下》里,作者一方面抒写了当代军人的思乡之情,通过讲述屋场演变、祖坟遭遇、童年困苦、故乡习俗、家乡巨变等许多感人故事,让乡愁成为一种催人奋进的文化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平台;另一方面又生动传情地告诉人们,军人既爱自己的家乡

和亲人,又视人民为父母,驻地是故乡。他们时刻胸怀“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大爱之情和感恩之心。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这本书中还专门用一章7篇文章,畅叙了许多爱自己的故事和思想。作者认为,爱自己不应是个自私的命题,当今社会存在的缺德、腐败、违法犯罪、自杀凶杀行为,都是源于不懂、不会、不能珍爱自己。有些人因为不爱惜自己的良心、不把自己当人、经常忽悠自己、给自己打折,所以才自己害了自己。正如作者所言:“一个不把自己当人的人,怎能做好人!一个不把自己当人的人,你怎能指望把他别人当人来关爱和尊重呢?”一个真爱自己的人,一定会做个有良心的人、有爱心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人活着,既是为自己,也是为亲人,为他人,为社会和国家担当一份义务和责任。我们既无权不把别人当人,也无法不把自己当人。”

今天的社会,特别需要弘扬人类精神的作家,特别需要传承人类正面精神的文学。正如普拉东诺夫强调的:“要人类获得幸福,文学就必须首先使人成为人,即通过充满诗意图和精神力量的手段,帮助人们摆脱那种黑暗的、野蛮的、庸俗的生活状态,从而最终将人类的生活向上提升到一个值得追求的境界。”

我也曾在《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和资源危机》中谈到:当代文学迫切需要正面价值。什么是正面价值?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看取光明、明辨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我也在《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中谈到:“作家的责任就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善于表达精神的作家能够做到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他们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应该是对人类某些宝贵价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魂魄。”

徐国良曾经系统地思考和研究过当今的伦理道德问题。我读过他的道德系列丛书——《德行天下》《诚行天下》《履行天下》《美行天下》《兵行天下》。这样系统的关于伦理道德的考察和书写,在当今中国文坛是极为难得的。

■创作谈

《中国丈夫》写的是小人物、个人命运,但背后是跨文化跨国度的大题材、大背景。这样的小说落到我这个没啥文化的人头上,自然得下不少功夫。小说分三大部分,是最后部分的华工最先引起了我的兴趣,100多年前的那场大战让整个世界动荡不安,在当时积弱贫穷深受列强欺辱的中国,竟然还派过14万人奔赴欧洲战场。要知道,那些华工是有组织的国家行为,出发前他们要经过严格的体检,戴上刻有自己工号的铜锁,分班按营接受军事化管理。可对他们每个个体来说,他们只是去卖体力讨生计,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亲手签下的合同里,是国家“以工代兵”的战略意图。他们只是一群无意识的历史参与者。可是,无意识并不等于无作用。回看我们人类滚滚的历史,多少例子可以证明,充满预设的历史,却因为无意识的突然介入改变了方向。就拿一战华工来说,当时两军交战已陷入势均力敌的胶着状态,就像一架砝码相当的天平,14万华工即使是一根稻草,那它放到哪一方,都会改变战局的结果。我就想,一群讨生计的农民,他们掏出挖壕、扛石头、做车工、抬担架、埋死人,与一战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2014年11月26日,法国政府在巴黎的华人社区向一战华工致敬,时任国防部长的勒德里安这么说:“14万华工中的每一个都阻止了法国走上灭亡之路。”在法国历史非常恐怖的时刻,华工的救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就是说那群身穿粗布棉袄、打着绑腿、满脸憨气(也可能是稚气)的中国人,阻止了法国走上灭亡之路,他们很可能就是那群无意识的改变历史轨迹的扳道工。

可他们只是一群朴实朴素的中国农民啊,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做?除了当年北方的自然灾害之外,他们知道自己要远渡重洋,要和曾经被自己视为蓝眼黄毛“怪人”的人一起战斗,在那个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而且战火连天的土地上,他们是是怎样活过的,他们带给了欧洲人怎样的理解?于是我去寻找这些疑问背后的原因,寻找民族、文化基因里那些隐性却牢固的东西。各种专家论文、资料汇编、传教士的回忆、旅游者的日记、士兵的日常生活记录,能找到的资料都我尽力去找。透过那些资料,历史深处的各色人等便开始由模糊变得清晰,由呆板变得鲜活,那些曾经被“因为”“所以”简单定义的事件,也日渐变得复杂和亲切起来。作家写作,不就是在努力探寻世界的复杂性吗?这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和勇气。

《中国丈夫》是写中国人,我只不过是放在了那个动荡时代,站在更为广阔的地方,换了视角罢了。我知道写这么“大”的东西不容易,搞不好就会成一堆误读和误解。辜鸿铭先生1914年就写过《中国人的精神》,曾在欧洲引起轰动,林语堂、胡适等一代大师也有过类似的文字,但那是大师们的看法,多是讲稿和随笔。我只是一个小小作者,写它是胆大了一些,妄图了一些,但有什么关系呢?我要提供我的理解,我的经验。我是不懂绘画,但并不影响我拿起笔来涂鸦啊。

这算是自说自话吗?我不认为。在创作《中国丈夫》期间,我是完全忘记自己是作者的,我心甘情愿只当小说的代笔或书记员。我呕心沥血完成它,只为听从小说的摆布。如果说小说从一开始就没有了局,布了阵,给我一堆“信心满满”的材料,我照它的意思去做,我上了当,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小说的创作就和历史一样,开始时有着那么美好的预设,打算着一切都完美,但最后发现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无意识的参与者出来捣乱,轰隆隆的历史就此改道,一部小说也就由此坍塌了。我不是没有这种担心,但我知道,担心也没有用。

我不是在夸大。说个笑话。抗战时期,我们村总受日军扫荡,只要炮声一响人们就会逃跑避难。有一天晚上,人们被慌乱声惊醒,一股脑儿地穿衣服下地外逃,结果翻山时把两个人挤下了山崖。等到天亮,人们发现西北角山墙上的报警树没倒,才意识到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来。于是大家追查警报源头,结果追到一对老夫妻身上。老妇人说她听到炮声响了,老汉说他没听到,只记得自己放过一个屁。于是就有了“一屁吹了全村人”的笑话。可被挤下山崖的那两个人,因为他们的死,全家人的命运就改变了。

在创作《中国丈夫》的时候,我常常想到这个笑话。笑话归笑话,历史归历史,创作归创作,三者有关系吗?我觉得有。当我们意识到隐暗之处那些无意识的常常被忽略的东西存在时,很多事件就变得好玩了,而且会让你哭笑不得。有时候,哭笑不得的东西更接近真相。

历史的预设与扳道工

□李晋瑞

独坐苍茫间,遥望远古时

□贾江涛

因为工作原因,我手头有李琳之近年来编著的所有作品,但真正完整系统地阅读他的文字,还是从《祖先,祖先》的书稿开始。

为了尽快进入他的思想和文字,编书期间我去了太原理工大大礼堂听了他一次“漫谈祭祖文化”的学术报告。也由此,我快步走进了他最近的研究领域,更零距离感受到他对于中华文化的执著和热情。

这份执著和热情也深深地浸透在《祖先,祖先》这部书稿中。诸多上古史疑点的考证,以及析城山活化石——当地民俗和传说的调查,可见他勤勉不倦的追索。他的新作将大散文写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抛却了板起面孔讲历史、有条不紊搞论证的枯燥性,游刃有余地把田野调查、文献记载、遗迹遗址和考古成果合而为一,将“三皇五帝”及众多远古英雄人物,从虚无缥缈的神话里拉回到坚实的地上,用生动轻灵的笔调将古事一一还原。如此呈现也许缺少学术性著作的严谨,个别观点也值得商榷,但正如作家王国伟在《面对华夏祖先的图腾》一文中所说:“李琳之将他对历史文化追索的触角深入地探触到历史时空的幽微之处,更敏锐地感知虽然缥缈却血脉相连的文化传承,让远逝的鸿影显现出朦胧的真相,使冰冷荒漠的历史有了人性

的温度……带给我们新的思考。”

我为《祖先,祖先》一书的腰封“设计”了一行字——这是一部足以颠覆你全部上古历史认知的全新力作。这句话的深意在于:炎帝很可能是一个部落联盟的称谓,他那一连串的别号应该都是不同时期这个联盟轮流执政的盟主国称号;“民主禅让制”和尧舜的悲剧性命运,他们虽然对于帝位的继承人选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遴选体系,但还是百密一疏,让历史的车轮把这些规则撞出了一个大洞,继而又碾压成了一片乱舞飞扬的齑粉;“三皇五帝”都不是具体的人,而是几个比较著名的氏族部落名称或该氏族部落首领的统称……这些观点无疑是具有颠覆性的,但因其合理的推断和缜密的论证,阅读者原有的质疑和抵触在不知不觉中确实一点点“被颠覆”了。

在一个人人都为传播源的新媒体时代,没有绝对的正方论点,也没有永远的反方辩手,尤其我们面对万千年前的事,祖先们的事。留下一行足迹,发出一种声音,供大家思考讨论,我想更为重要。事实上,书稿完成不久,李琳之就被中央电视台文化系列片《华夏之源》特聘为文化历史顾问。历史的本来面目如何?我们将如何一路走来?……探寻的路上一直人声鼎沸,熙熙攘攘!

太原理工大学李永福教授在《北京日报》刊文说:“读完《祖先,祖先》,我的第一感觉是震撼,震撼于他在书中所揭示的我们祖先不为人知的那个宏大真实的世界,这一点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中国上古文化的传统认识。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颠覆还不是简单的推倒、破坏,而是进行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对中国古史文明体系的重构建设。”

“远处,山腰里那个绝地天通,已经被逶迤山体上的层层金黄覆盖得无影无踪。历史与苍茫连成了一片,传说同大山融为一体。我独坐莽莽,把自己置于遥远的上古,静静地聆听着祖先亡灵如怨如泣的诉说……”这是《祖先,祖先》其中一章的导语。独坐苍茫、遥望远古,也正是李琳之近年来历史创作的真实写照。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听说李琳之的《山西笔记》也即将付梓。几年来,他一直在用他浓重的襄汾口音为山西文化的振兴鼓与呼。他说:“……我的笔不仅要将真实的过去还原,我还要把今天作为华夏之源、中国之源的山西介绍给世人,我要告诉全世界,《祖先,祖先》所揭示的那个远古祖先的宏大世界就是山西历史文化的灵魂,世界上唯一流传至今且还在不断发扬光大的中华文明就发源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此刻,我仿佛又看见了2017年“文博会”上为“山西文旅如何破局”滔滔不绝的李琳之,又看见了在大学讲坛面对莘莘学子慷慨陈词的李琳之;更看见了上至昆仑下至析城求索苦行的李琳之……跋涉,大概是李琳之一生的注脚;突破,必然是李琳之永远的追索。“没办法,我就是这个命”,他轻轻抚了抚他那永远不变的发型,望向苍茫的远方……

我对这个侧影肃然起敬。

■品 鉴

日常生活的深渊

——读王威廉《生活课》 □唐诗人

从我对王威廉以往小说的印象来看,他的小说更侧重于讲述荒诞的生活故事。比如《非法入住》系列的三篇小说,还有《内脸》《第二人》等,以及长篇《获救者》。这些小说的故事都是荒诞的,作者对现实的意象和漫无边际的虚构被看得特别重要,很多作家也以呈现无厘头式的故事来炫技一般,进而成为先锋论者们情有独钟的分析对象。但其实,这种呈现荒诞的手段,属于笨拙的一类。荒诞的故事应该建立在现实的真相之上。现实是什么?对此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见解。虚构怎样的荒诞故事,就能看出作家对现实是持怎样的意见。

《生活课》这部小说集里,也有一些纯粹是荒诞故事。像《书鱼》《鲨在黑暗中》,这些都还是王威廉之前《非法入住》《内脸》一类小说的荒诞方式。《书鱼》化用卡夫卡的《变形记》。书鱼也名应声虫,进入人身体后,可以跟着人说话,声音就有了回声。叙述这一“变形”的故事,想要说明什么,

作者在文中也有清晰的表达。人从书中汲取知识,沉浸在书本世界,会不会也是一种虫?书本在异化我们吗?这是作家对自我、对人类、对文化知识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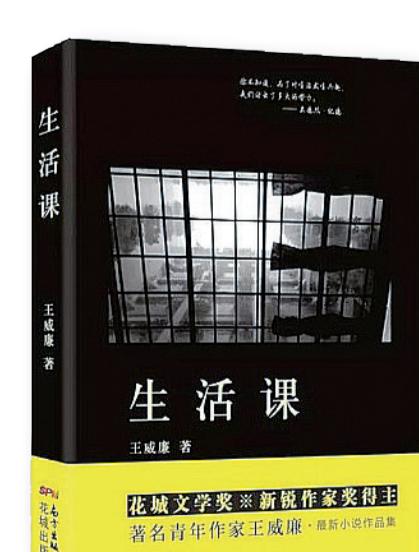
《鲨在黑暗中》颇多寓意。鲨能说话,懂哲学,它的庞大与侏儒叙述者“我”的矮小形成对比,鲨似乎是另一个“我”。一个高大的鲨鱼之“我”劝说一个矮小的现实之“我”放弃邪恶。“高大”却同时也是一种原始的、吃人的、残忍的“鲨”。处于黑暗中的鲨,其所谓的“仁慈”又曾吞下多少血肉之躯?这一类小说,荒诞是故事本身,也是对现代人、对现实荒诞特征的多维度折射。

或许,对于很多非具体问题,如果作家不虚构一种荒诞故事,不将现实生活进行扭曲化表达,那就无法把问题的复杂性表现出来。王威廉的《非法入住》《内脸》《第二人》以及《书鱼》《鲨在黑暗中》等都是如此,这些建立在现实生活之上的荒诞故事,证明了王威廉的虚构创造、文学想象能力,其中内含着一种对精神思想的抽象表

达能力。

把现实生活扭曲、变形后的荒诞写作,这是荒诞叙事的一个面向。我以为,还有另外一种荒诞的反思。《鲨在黑暗中》颇多寓意。鲨能说话,懂哲学,它的庞大与侏儒叙述者“我”的矮小形成对比,鲨似乎是另一个“我”。一个高大的鲨鱼之“我”劝说一个矮小的现实之“我”放弃邪恶。“高大”却同时也是一种原始的、吃人的、残忍的“鲨”。处于黑暗中的鲨,其所谓的“仁慈”又曾吞下多少血肉之躯?这一类小说,荒诞是故事本身,也是对现代人、对现实荒诞特征的多维度折射。

日常生活就是最大的荒诞,这在现代、后现代的城市社会变得特别明显。现代的荒诞,是不可承受之重的荒诞,后现代的荒诞,往往是不可承受之轻的荒诞。但它们本质上又是相通的,都是对生命质量、对人生意义的探问。现代文学里,卡夫卡、加缪等人的写作,就是用荒诞故事表达出生活世界对人精神世界过于沉重的压迫,在反抗现代秩序的过程中追问人的存在性意义。而后现代的荒诞,如《在路上》《第二十二条军规》



等,这些放纵生活书写、黑色幽默风格,将生命之轻叙述得不可承受。这些小说,故事性质都比较传统,叙事上也不太使用夸张扭曲等修辞方式,但通读下来,会感受到这些看起来特别实在的故事却有着最荒诞的面目。

王威廉应该是对这两个方向的荒诞叙事都谙熟于心。《生活课》集子中的《父亲的报复》《捆着我,绑着我》《胶囊旅馆》《无据之夜》《云上,青

春》《生活课》《全世界受苦的人》《天使沉默》,这些小说的故事都比较平常,在叙事上也都相对平实,甚至近于日常生活写实了。但是,它们又都有着荒诞的根本面相。《父亲的报复》是对城市身份认知的反思,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差别到底何在?揭示出如今城市生活中地域歧视的荒诞。《捆着我,绑着我》是对城市漂泊一族存在感的反思,让我们看到现代人的生命之轻。《胶囊旅馆》里,两个女性躲进棺材一样的胶囊旅馆,阳光女孩奔向死,忧郁的“我”面临生,这胶囊旅馆里的生与死,就是现代城市人生活、生命的缩影。

这些小说,既有现代的荒诞,也有后现代式的荒诞,但它们都是糅合在一起的,很难界定说某一篇就是现代的或后现代的。《生活课》里的洗碗之争,多么轻啊,却不可承受;而这对夫妻的争执,却又是围绕“重”的理解差异上的争。《无据之夜》,欢乐中的绝望,生命既轻又重。无法区分,现代与后现代交互着、混杂着,但这就是我们的现实。重的东西把我们压得无以喘息,轻的东西突然间变得不可承受。或者说,在现代城市生活这个宏大的沉重的包袱底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轻”显得是多么虚幻、荒诞。

《生活课》里的故事,几乎就是现代城市生活里最为普遍的日常生活片段。很多场景、心理、语句,也几乎都是我们最经常见证着感受着使用的那些。阅读《生活课》就是回味我们自身的经历,也是自我内心的审视。